

# 再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

□ 李今庸\*

(湖北中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961)

关键词 中医 西医 中西医结合



我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在医学领域里，一直都展现出中医学的一枝独秀。迨至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爆发，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因而西方文化涌

进了中国。随着列强对我国的文化侵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宗教，并办起了西式医院，从而中国开始出现了中医、西医两种医疗并存的局面。始而清末中医唐容川欲将中、西两种医学汇通之，然汇而未能通；继而民国西医余云岫在半殖民地社会思潮支持下大叫“废止中医”而强树“西医独尊”，欲使我国医学丢掉民族性，导致中医药学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倡“把西医药的知识和中医中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接着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人轻视、歧视和排斥中

医的错误思想，并先后创办了中医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以发展中医事业。在 1958 年，我国报纸上正式出现了“中西医结合”这一命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的探索，且先后两次掀起了“中西医结合”的高潮，然而我国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已经实践了 40 多年，几近半个世纪，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至今尚未能见到一个真正的学术上有机结合的成果，而且还在一片弘扬传统文化中医药学的声浪中、在一片中医药事业繁荣发展的赞歌声中而丧失了中医药学的灵魂，形成了中医有其人无其术，名存实亡，名中实西，中医躯壳包藏着实实在在的西医内核，中医几乎人为地全然西医化。时至今日，此情此景，

\* 作者简介 李今庸，男，著名中医学家。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首批 500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客籍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新中医》顾问，本刊学术顾问。

我们医药卫生界实有必要像我国文化界、社科界、哲学史界、美学界等一样，作一番认真的反思，反思我们对中、西两种医学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思我们对民族传统医学的感情和心态，反思我们以往在中医药研究上的观点和方法！

中医、西医，是我国现实存在理论体系绝不相同的两种医学，其分别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而各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

众所周知，西医学是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出现了实验“细胞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还原性医学，以机械唯物论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人体就是一个“细胞的总和”，人体生病则为某病原体侵入导致了某细胞组织发生病变，治疗则采取“无情斗争”的“对抗疗法”，或对病原体杀而灭之，或对病变细胞组织局部切而除之。这种医学注重微观研究，忽视对事物的宏观认识，造成了一种静态观点，故对事物的认识深入、深入、继续深入，从而对客观世界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见病不见人，见物不见世界，自我迷信，自我陶醉，自认为其是绝对真理，是唯一科学，否认世界科技文化的多样性，否认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性，拒绝容许其他不同医学的同时存在。然中医药学则是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里，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世界东方的中华国度里，古代先民长期与疾病坚决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直接经

验，不断总结，不断整理，不断把丰富的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以古代辩证法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有智慧、会劳动、能创造，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赞天地之化育”，并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因而在医学世界里当以人为本，尊重人，关爱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病人治愈疾病。这种医学注意宏观研究，重视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事物因果关系，具有动态观念，认为人禀阴阳之气以生。人体各部组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周围环境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统一体总是处在一个和谐与平衡协调之中而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人体生病则是某种致病因素导致了阴阳气血失去平衡协调而不相和谐使然。体内病变，必遵循“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规律，显现出相应的病证，治疗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施治，并随着病情变化“病万变药亦万变”，以调整人体机能，使其阴阳气血恢复平衡协调而重归于和谐状态以愈病。

据上所述，中医、西医两种医学具有“质”的差别性，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哲学基础不同，医学模式不同。二者没有同一性，在这种条件下，企图将中医、西医这两种医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新医药学理论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要使中西医有机结合，必待两种医学各按

其内部规律发展到医学模式的转变，西医学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医学由“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届时中、西两种医学始有可能结合成为一个具有辩证思维形式的新的医药理论体系。因而必须根据中、西两种医学各自发展的内部规定性加强研究，促其按自身规律不受干扰地正常发展，西医药学中国化，加速其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学现代化，则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按其内部规律，以客观态度进行认真的细致的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揭示其科学本质，用现代的思维和语言表述之，赋予这个时代的特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中医药学现代化，必须保持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和优势，以东方文化的面貌走向现代化，而不是抛弃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和优势而使之异化，因而绝对不能先验论地把脑子里先有的东西塞到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中

去,以西医原有理论取代中医药学理论,把中医“西医化”。若如此,这就丧失了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恰当的。我国中西医学的有机结合,这本是将来可能实现的事,似乎不是近二、三十年所能达到的,故现在不宜多提倡,大肆鼓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只会有害于中医药学,最终也有损于学术上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早就告诉过人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然而有些人却不顾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硬把将来可能实现的事情拿到此前就开始做,到现在已接近半个世纪,还有行政力量的推动和报刊杂志的鼓动,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学术上有机结合的科研成果,反而阻碍了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推迟了中西医结合的进程!然而最近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在医疗工作中中西医合作共事,即中西医在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或中西医两法治病,混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尤其在2003年上半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在北京肆虐时,某些怀有西方霸权主义同样心态的中国人,始而不让中医参与对“非典”的治疗,在西医治

疗“非典”显得“黔驴技穷”而束手无策时,在中央领导倡导下,5月8日起,中医药全面介入于北京地区“非典”的防治工作,旋而使北京地区居高不下的“非典死亡率”立即降了下来,凸显了中医药对“非典”的治疗优势。但在报道中却连篇累牍地笼统的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把抗击“非典”工作中的中西医紧密配合,误说成是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显而易见,这种报道缺乏表述事物的准确性,显得名不副实。然从具体医疗工作角度看,根据临床治疗实际需要,中西医紧密配合或中西医两法治病,在当前条件下都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学术上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因为二者在学术理论上没有内在的联系,故尔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它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形式,而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定义,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指出:“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在一起(既是玻璃圆筒,

又是炊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折衷主义阻碍着辩证思维的道路,它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因而在构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只能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物的本质联系,从事物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客观地把握医学发展的方向,推动医学的前进。绝对不能把毫无内在联系的两种医学硬凑在一起,贴上“中西医结合”的标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现在一些怀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心态的中国人,在“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指导下,正是玩弄这种手法。他们把“中西医结合”叫得震天价响,背地里贩运着贴有“中西医结合”标签的“中药加西药”、“中医理论加西医理论”的“中西凑合论”,以此欺骗群众,也欺骗政府,从而掏出别人口袋的东西填入自己的腰包,并博得一大批学术浅薄的追随者,指导其或与其共同掏空别人囊中的“阿堵物”。如此而已,岂在他哉!

思想独立 学术自由 广采博收 兼容并蓄

## 中医药通报杂志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